

Europe
Cultural
History

欧洲文化史

[荷兰] 彼得·李伯庚◎著

上



Europe
Cultural
History

欧洲文化史

[荷兰] 彼得·李伯庚/著
赵复三/译

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希腊陶瓶

这是希腊人独有的陶瓶，瓶上的图案显示陶器作坊生产的情况。这种陶瓶主要用于庆祝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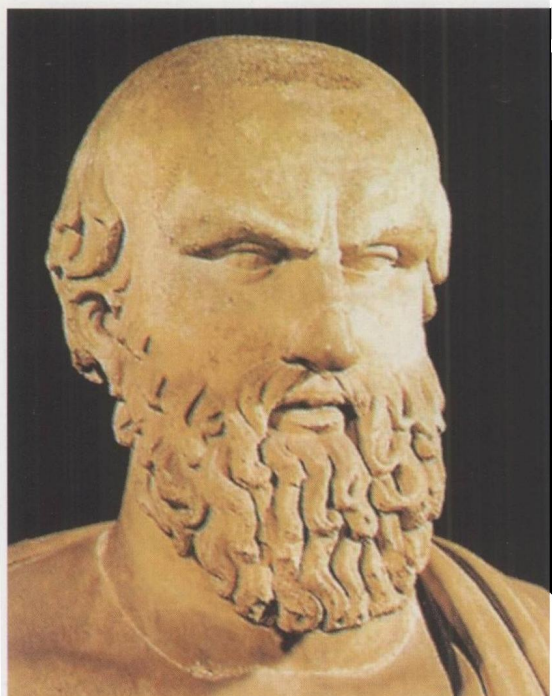
雅典碗

图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碗，这类希腊人独有的碗，主要用于婚礼庆典。



希腊的大理石少女像

此为雅典卫城柱廊上的少女像，大约制于公元前 5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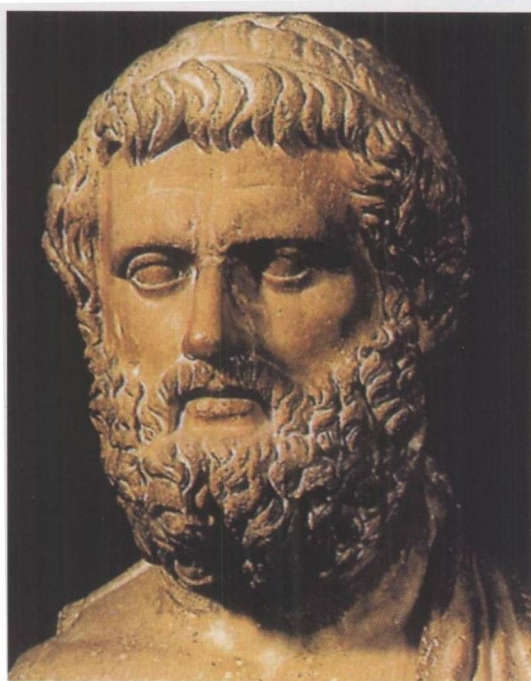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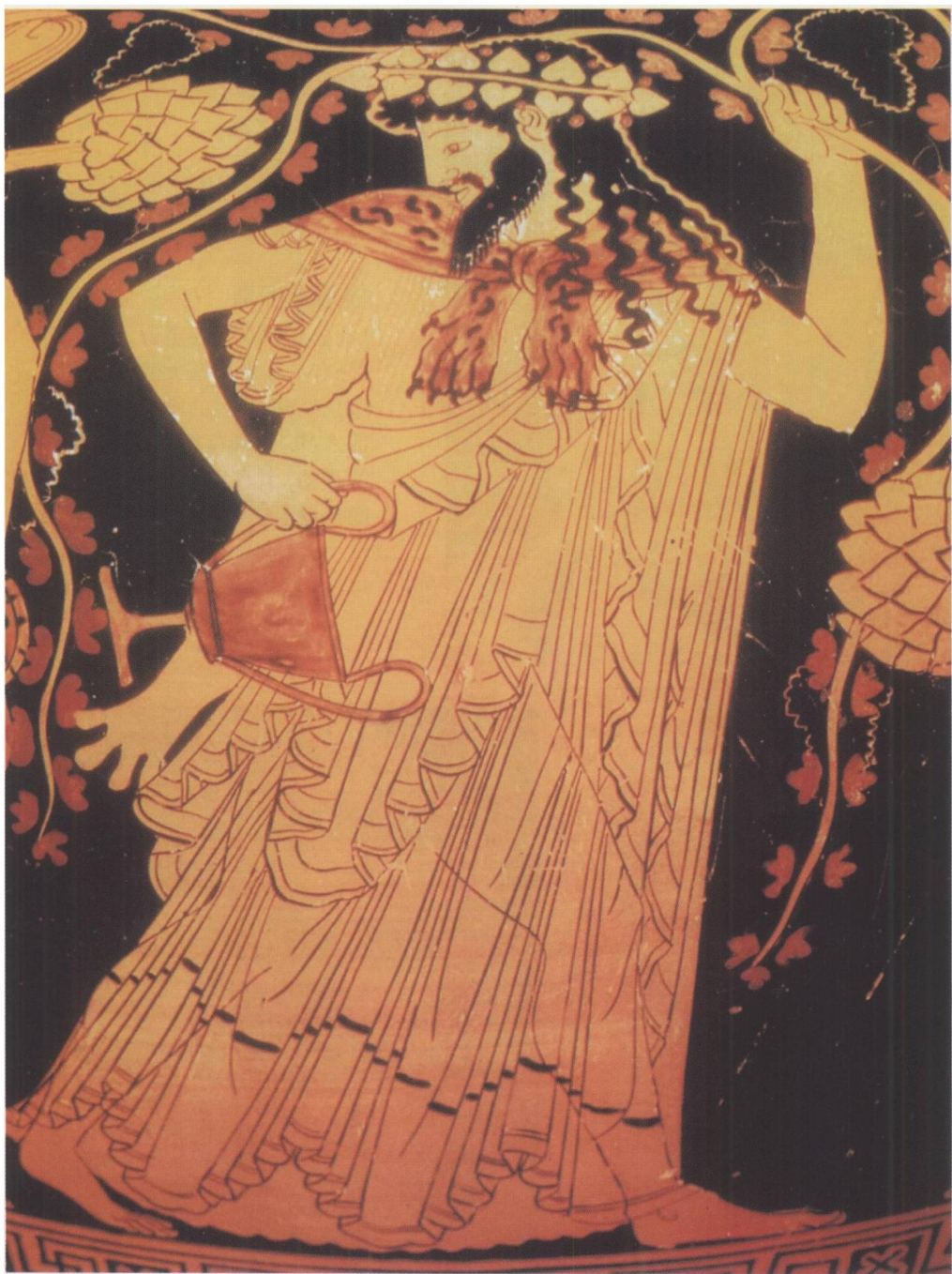
埃斯库罗斯

(约公元前 525 年至公元前 456 年)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他写过的剧本有 90 部之多, 但现存仅 7 部完整的悲剧, 其代表作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苏格拉底

古代世界的两个伟大的教育家, 一是中国的孔子, 另一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一生虽没有著作, 但他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却把他的言行和思想记述并流传后世。





雅典的酒神：狄奥尼索斯。



珠宝十字架

这个名贵的十字架，是查士丁尼二世送给罗马主教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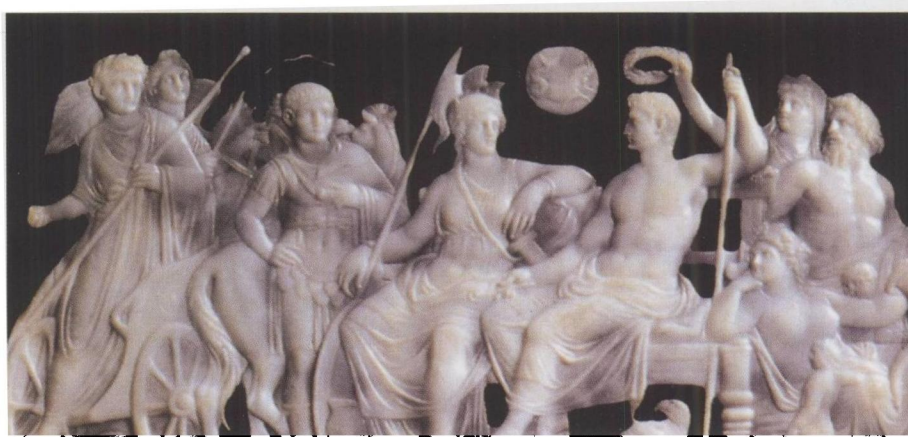


抬羊图

图为一牧羊人把迷途的羊寻回。这幅作品充满了《圣经》中上帝引领迷途羔羊返回正道的意味。



希腊的胜利女神
头上带着橄榄枝制成的花环。



这幅制于公元前 10 年左右的浮雕，描绘了奥古斯都被花环加冕的情况。



马克·奥里略军队正通过罗马的凯旋门，受到人群热烈欢迎。

我的中国读者们：

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总梦想他所写的文字能有读者，而且愈多愈好。这是一种人所共有的真情。而有的时候，这个美梦竟然得以实现到超过人所能向往的程度。一个荷兰历史学者用英文写作的《欧洲文化史》得到一位中国同事建议，把它译成中文，就仿佛是中国这个拥有伟大传统文明的国家把它的大门敞开了。

中国对世界其他文化所作的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为过的。多少世纪以来，许多中国的思想和器物，从东亚经过海路，跨越沙漠，到达欧亚大陆的西部。欧洲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得益最多的可能就是和中国的文化联系。

令我高兴的是，1675年，把孔子的《论语》首次以有韵脚的欧洲语言，翻译出版介绍给欧洲大众的，是一位荷兰人彼得·范·霍恩（Pieter van Hoorn）。他在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中国清廷的使节之后，做了这项工作。彼得·范·霍恩还着重指出，孔子的思想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他的思想和构成欧洲社会基础的耶稣基督的思想是协调一致的。

现在，一位我所敬重的中国同事赵教授把一部荷兰人撰写的《欧洲文化史》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各界读者。这令我想起3个多世纪前一个荷兰人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的史实。如果这本小书能够把欧洲和中国这两种伟大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进一步联结起来，可以说，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彼得·李伯庚

2001年6月

面对大海的断想

从大西洋岸、西北欧的布拉班古城来到东南欧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离上次访问雅典登上奥林匹斯山，在阿克波里斯神殿的残柱中间徘徊，已经55年了。只是希腊的天空和与它相辉映的地中海，仍旧那样蔚蓝，滔滔海浪仍旧永不止息地唱着历史之歌。一部欧洲文化的4000年历史从这里开始，是有充分原因的。这是欧洲东南隅的海上边界，4000年前（相当于中国夏朝），岛上的希腊居民在和埃及与中东各民族的海上经济文化交往中发展了欧洲最早的米诺阿文明，由海岛传入希腊本土。至于米诺阿文明和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及他建立的希腊帝国、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和东罗马帝国的“盛世”，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的拜占庭帝国，都早已没落，化为历史的陈迹，任人凭吊。报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惟有亚历山大皇帝的故乡马其顿，也只是因为那里的民族冲突发展为战争，不知如何结束。面对欧洲各国的兴衰，像眺望海水的涨潮和退潮，一个中国人想些什么呢？当然人各不同，而且有不同的想法，多总比少好。重要的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道路和经验去认真思索，是不是这样呢？

* * * *

不久前，诗人怀宗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到海外，不论多久，怎么心里总也放不下中国？当时我回答不出，就像问我为什么爱母亲我回答不出一样。于是，这也成了我的问题，时刻纠缠在脑际，要求回答。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爱国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20世纪30年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因被纳粹迫害而流亡海外。有人问他：“你想念德国吗？”他回答：“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中国大概不会这样回答，想到中国时，总和那片土地的山川平原，那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人连在一起，或许就因为中国幅员面积太大，中华民族人口太多，因而产生一种“万有引力”？

1822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从哲学角度看世界历史》（《历史哲学》是后来英译本给它另起的书名）时，指出在有悠久文明的古代各民族中，中国人

的特点是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可以就黑格尔的观察接下去说，历史意识并不仅仅是尊重历史，把历史事实认真记录下来，而是树立一个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从历代统治集团来说，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对自身统治意志的“深刻意识”：一切，包括修史，都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在人民大众中间，则另有一种对历史的深刻意识，表现为另一种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一切事情要看它对人民大众的态度。这是2000多年中国人民思想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爱国不只是眷恋桂林山水、德州烧鸡……从根本说是爱中国的广大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是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在历史中真正能够长存的，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践所结晶成的文化。

国家、朝代有它的兴衰，文化也同样有它的兴衰。西方人读西方文化史，总要从埃及古代文化说起。但是埃及帝国的古代文化早已没落了，皇帝和美女都早已成为骷髅，化为尘土，只剩下少数考古学家、数学家还在研究：当初建造金字塔时，天文学和数学上的测算何以那样精确。巴比伦帝国的古代文化也早已没落了，亚述帝国的文化也早已没落了。文化悠久、民族强大，并不能保证“源远流”就必定“流长”。阿诺德·汤因比研究了人类有史以来有影响的21种文化，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还继续发挥广泛影响的只有5种，其他文化都已没落了。汤因比以西欧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欧的东正教文化圈、从北非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和东亚文化圈来概括今日世界文化的不同类型，这是否最科学合理，也许还有可以斟酌的余地（克立佛·吉尔茨在《对伊斯兰的观察》一书中便指出了摩洛哥和印尼的伊斯兰实践多么不同），但重要的一点是它指出了**文化有兴也有衰**。

文化的兴衰以什么来衡量？主要看两方面：首先是看它对这个文化圈内部人民大众发挥的凝聚力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二是看它对世界人类社会前进作出的贡献。离开这两条来谈文化兴衰，恐未免表面化。如果以这两条来衡量中国文化，怎样合乎实际地评估今日中国的文化状况？

文化怎样就“兴”？怎样就“衰”？欧洲人对自己的文化总是上溯到希腊罗马，现在所称谓的希腊罗马古典思想，实际是希腊人吸收了埃及和中亚各民族文化而初步形成的，罗马人兴起后，除吸收希腊文化外，又吸收欧洲北部克尔特人、日耳曼各民族文化，以及北非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此后，8到15世纪间，欧洲人又吸收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间接还吸收了东亚文化），经长期与其他文化交流而发展成人们观念中的所谓“欧洲文化”。中国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在公元前，只是在东亚大陆的范围内融合各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比较自足。而后通过北方陆上的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的丝绸之路吸收了主

要是南亚的佛教文化，当时大众思想是自由的，国家政策是开放的。因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无论西方或东方的长期历史经验都表明，任何民族，愈是思想上谦逊、政策上开放，能吸收不同文化，自身的文化就愈兴旺；如果反过来，思想上自大，或政策上闭关锁国，排斥外来文化，自身的文化就萎缩。**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中国人，是否认真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学习了呢？**抑或沉醉在“历史文化悠久”之中，强调国情独特而排斥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或是认为东方文化必将统合西方文化，以此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前途呢？同样是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试以两国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比较一下。日本从幕府时期长期闭关锁国之后，1854年国门被美国炮舰打开，自明治维新起，吸收外来文化是全方位的、认真的，因此，它的现代化进程就比较快。中国在乾隆皇帝答复英皇乔治三世的信中，已经表现出一种文化思想上的自大。1840年国门被英国炮舰轰开之后，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不能再闭关锁国，文化思想上却仍然是抱残守缺的。不知与中国的漫长历史有无关系，甚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从事介绍外国文化的学术翻译工作似乎也不如日本学术界翻译外国学术著作那样热心积极并且严肃认真。

19世纪的中国是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俎上肉。20世纪，被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亿万中国人，经过一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站立起来了。21世纪，将是中国人走入世界的世纪。但是，中国人肩上既背负着“悠久文化”中的包袱，又背负了20世纪历史的包袱，能以轻松的步伐走进世界吗？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是敬佩的，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从物质文化说，进步的地方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精神文化方面就很难说了。到中国经商、旅游、进行文化交流的人们，并不都是来自西方国家，有的来自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海外华人，也并不都是戴“反华”的政治眼镜，许多是对中国文化抱敬仰，对中国抱友好的感情而来的。他们的足迹踏遍全中国，总觉得中国的各种宣传和他们的切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今日中国大众追求的是什么？大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程度如何？政治道德、商业道德、社会公共道德的水平如何？政府官员是否廉洁奉公、一心为人民服务？下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如何？知识界既然受到更多的教育，是否因此对社会负起更大的责任，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出国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如何？经过100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如果和40年代全民抗战时比较，和20年代五四运动时比较，和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比较，有了哪些进步？这一切是否值得有头脑的中国人深思一下呢？其他民族的发展经验是怎样的？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是中国国情特殊、文化优秀，不必也不能向其他民族学习了呢？

这些是使译者困扰、在思想和生活的困扰中翻译这本《欧洲文化史》的原因。

*

*

*

*

过去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边教书边游学，一直留意，希望找到一本既能反映全貌，又摆脱民族偏见，又能反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优秀的欧洲文化史，可以介绍给国内的读书界。可惜孤陋寡闻，始终没有找到一本满意的书。其中，有自己的一份偏见，总觉得正如讲中国文化，首先要看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外国学者来讲，总不免有隔靴搔痒的地方。讲欧洲文化，首先还是要读欧洲学者的著作，头脑的知识和内心的触动是两回事，有切身体验和没有切身体验是很不同的。但另一方面，欧洲学者有时也有本国的局限性，需要仔细比较筛选。从北美转到西欧，向有关学者请教，终于找到了荷兰天主教尼梅根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李伯庚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新著《欧洲文化史》。荷兰在今日欧洲不是大国，但是在近代欧洲文化史上却有其自由思想的传统。15、16世纪间，北部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通常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著称)起了重要作用。在历史学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赫伊津哈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后期历史的重要人物。梵高是以他的绘画来进行文化批判的巨擘。李伯庚教授这本书，继承了文化批判的传统，就浅见所及，有几个特点。

第一，它破除了历来这类书的“西欧中心论”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既抓紧欧洲这个中心，又从世界史的全局去看欧洲，这是十分不容易的。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没有把东欧斯拉夫文化圈包括进去。作者坦率地说，这是因为他不具备看古斯拉夫文献的语言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仅就西欧来说，要读的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和古哥德文等中古文字的文献就已浩如烟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是值得敬重的。

第二，着力把握欧洲文化历史中“一”和“多”的关系。中国以华夏族为中心的文化，自周朝起，以中央帝国政权更迭划阶段的帝国历史，其政治、文化中心和脉络比较清楚，比较容易处理。欧洲自古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和昙花一现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中心王朝，也没有一个中心民族，情况比中国历史复杂得多。古代便是希腊人、罗马人和北部克尔特人的三个世界并立。以后，克尔特人向西进入高卢，再向西登上英伦三岛。再有日耳曼人进入欧洲北部，又分为三支：有的其中还包括不同的小民族，分布在莱茵河地区、高卢、勃艮第、意大利半岛北部的隆巴第，定居下来；另一支消灭了西罗马帝国，还有一支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葡萄牙）。由中亚台地经巴尔干

半岛北部进入欧洲的各民族来龙去脉，欧洲古代史学者也不能意见一致，不少问题还在研究中。如果从语言来分，可以大体分出拉丁、条顿（日耳曼各族）、斯拉夫语系的文化圈，在斯拉夫各族地区和西欧各族之间，还有一种混合东西欧文化的所谓“多瑙河文化”，以波罗的海和巴尔干之间的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一线为代表。在多样性中，又能捉摸到其中有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从古代地中海东岸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区经商发展起的字母，转化为以希腊字母为基础的欧洲各国拼音文字书写体系；二是从罗马帝国公元1、2世纪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会。宗教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又十分复杂。承认并且尊重、容纳这种复杂性正是欧洲文化的特性。从欧洲的情况和经验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必然促进各民族的融合，而是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宗教在其中又起了巩固和加强民族意识的作用。中国由于秦以后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和汉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压倒性地位，因此对其他民族的特性、民族意识、民族宗教、民族要求常常不多注意，无论统治集团或自觉不自觉受它影响的思想界，往往喜欢强调统一性，不喜欢去认识客观存在着的多样性，有一种不自觉的统治集团和大汉族主义意识。这是否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第三，对于文化的广阔视野和深入理解。通常的西方文化史讲到文化时，往往只指高级文化，而所谓“高级”，往往只是指学术论著、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否精致，即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问题。本书却把大众文化如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怎样支配闲暇时间等也包括进去。这不是单纯把文化范围看得宽一点或窄一点的问题，重要的是：它推动读者去进一步思考文化本身的特性。所谓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从政治和阶级意识形态来分析，是一种角度，在今日中国，多少已形成一种“人为的传统”。如果从文化本身来看，情况就不同了。把文化看为个人和阶级活动的自我表现，看为客观世界或个人主观世界的“反映”，这只是文化的低级阶段，而文化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它更重要的意义乃是面对现实，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对人自身的批判性反思，这是社会和文化得以发展的动力，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标志。文化的“高”和“低”，从根本上说，在于它能不能对社会（包括文化自身）进行批判，以推动社会前进；至于形式上的精致或粗糙，乃是第二位的问题。这是两种性质，同时又相联系，构成两个发展阶段的文化，它们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这样，文化变成活的，随时代经济社会变化而流动演变；它是主动的、创造的，而不是被动的、机械式的。文化的特性决定它的内涵，自然收集史料的眼界也拓宽了，使作者能够注意发掘过去史家没有注意的新材料，为其他许多同类著作所不及。

第四，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从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中把握上面所说文化的特性。从欧洲文化的历史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出：欧洲文化在15世纪前，主要是认识外部世界，是重于知识的积累和消化。自15世纪起，欧洲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部广阔世界的“发现”，推动了各民族的先进思想者对古典精神价值的新的追求，又以大众的语言文字和喜闻乐见的其他形式扩散到社会各阶层中去。这种追求既然产生于社会环境之中，自然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但它的特性不是仅仅消极被动地反映社会，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社会的精神面貌，并且不断进行自我（包括对文化本身）批判，以推动社会前进。这种从精神上对社会及其各阶层生活方式的批判，是近代欧洲文化的特性，从这里可以了解近代欧洲文化与社会前进的轨迹。

对于当前欧洲，作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或许有另外的看法。这并无妨。它至少可以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到，今日欧洲学术界人士中对今日欧洲有这样一些看法。

* * * *

译者学力有限，文字水平不高，译书其实是自己的学习，也是一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点履迹。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无限感激。本书得以出版，有赖霍英东基金会和铭源基金会的热心资助和国内外学术界同事的鼓励与多方协助，谨此致谢。

译者

2001年5月于克里特岛